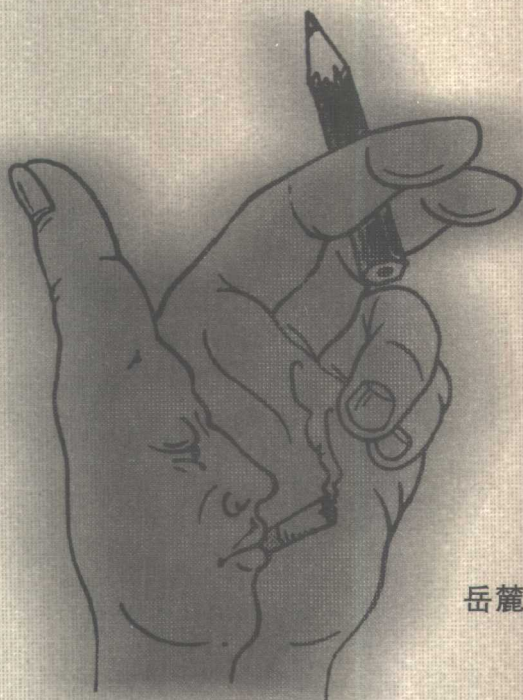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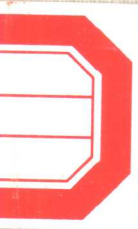


人物评价论

● 李屏南 / 著



岳麓书社



岳麓论丛

人物评价论

李屏南/著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夏剑钦
封面设计 黄 朝

人物评价论

李屏南 著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宏发印刷厂印刷

200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875

字数:190,000 印数:1-2000

ISBN7-80520-821-2

I·489 定价:12.00元

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地址: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引 言

睁眼看历史,睁眼看世界,各种各样的人物必然纷陈于你面前:

回首过去,有孔子、秦始皇、马克思……

怀顾当今,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翘首远望,有克林顿、叶利钦、萨达姆……

俯视近处,有张三、李四、王五……

此时,你如果是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又对他们或其中一部分人感兴趣,就一定会发生如何看待他们的问题。

所谓如何看待,就是如何认识,如何评价。

本书考虑的评价,存在两个前提:

第一,评价主客体的界定。

过去把评价人物大都定位于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范畴,我以为是一种片面性,是长期历史形成的一种积习,还是长期“左”的指导方针造成的一种弊端,抑或二者均有?值得深思。

科学地说,评价人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从广义来讲,人只要是社会的人,就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同许多人打交道,就有一个认识和评价他们的问题。此人英俊潇洒,此人诚实可信,此人言过其实,此人猥亵可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都是一种评价。当然,这样的评价大都有正与误、深与浅、表与里之分,但毕竟也是一种评价,而且还是一种不可

等闲视之的评价。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很多议论，尤其是民间议论（包括民间顺口溜），看似没有专门家的深和准，但都反映了民心 and 民意，其间的真理性是不可无视、轻视的。君不见，在林彪、江青权倾一朝的时候，“奸臣”、“妖后”等议论也是早有之、广有之，结果都一一而言中了。

从狭义来讲，主要指评价的职业性和专门性而言。就我们国家来说，这类评价主要集中于两类人：

一类是各种专门的理论工作者，尤其是史学理论、政治理论、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人物尤其是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自然在他们研究的视野之内。各个学科的理论工作者对一个人物的研究，可能角度不一样，如同是研究毛泽东，史学理论工作者一般着重于研究他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则侧重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各个方面的贡献和不足，而文学理论工作者可能对他的文学成就和文艺思想更有兴趣，但都属于一种专门的理论研究。它可能有见仁见智之争，但一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圆其说，自成一体，不是一种浅层的“七嘴八舌”。

二类是官方人士的评价。这里应该又有两类情况之分。一是最高权力部门对人物的评价。这种评价主要包括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对已经去世的人物，或以悼词（过去是祭文）或以决议进行评价。如对毛泽东，由于发生了晚期的严重错误，如何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必须有一个全面的公正的评价，于是就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二种情况是由于职务升降需要对某人进行评价。如邓小平评价江泽民说：“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他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二是具体管理部门的评价，或表扬、批评，或提拔、处分，都必须对某人

进行一番评价（如鉴定）后才能选择。

这两大类评价，对象虽然都是人，但区别也是显然的：一是具体对象不同。前者主要是研究已成为历史的人和事，后者则大都是现实中的人；二是目的不同。前者主要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作为后来者之楷、之戒，后者则主要是为了宣传、教育、使用，或奖或惩或升或迁；三是评价成果不同。前者主要以理论著述作为自己的最终研究成果，而后者却以鉴定、意见或某人所得到的实际地位如名和利而显示其评价成果。这是它们的不同点，正是由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区别，故长期没有把后者纳入人物评价之列，我觉得有合理之处，但也有失偏颇。

本书企图别开生面，把二者统为一体，可能笑煞大家。但本人情愿抖胆一试，如果实属不伦不类，也可为后来者提供一个不可效法的教训吧！

当然，我这样做，既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想来个故作惊人，而是经过长期的思考，自有我自己的一番道理。

首先，研究对象是相同的。二者研究的对象都是具体的人物，它们的区别一般只是死人与活人、杰出人物与一般人物罢了。例如，理论上的人物研究，大都把目光投向死去了的人物，而且是死去了的杰出人物、特殊人物；而实践中的人物评价，则一般都是现实中的人物，而且大都是正在舞台上活动的人物，这些人物包含面很广，上至国家领袖，下至普通群众，中至特殊人物、骨干人物，如提拔对象、宣传典型。但是，不管何种人物，只要对他研究和评价，基本的内容、本质的涵盖都是共同的。不管评价什么人，都必须涉及他一生的思想、品德、行为和业绩，都必然要对他的一生作出本质性、整体性的判断，死人与活人只是生命的界定，杰出人物与普通人物也只是贡献大小的定位。

其实，研究历史人与评价现实人，从理论上说，对评价主体应该没有什么严格分工的。过去史学家不敢碰现实人，是因为有“雷区”，生怕触雷自亡，现在开始有人涉足了，但也是小心翼翼。之所以没有完全销毁雷区，原因不仅是主观的，而且也有诸多客观原因：

一是只缘身在此山中，难识庐山真面目。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太近了的事情反而难以看准确。有的还没有完全展开，可能看得不全面；有的还有待历史去检验，可能看得不准确；有的还需放一段再说，可能看得不冷静；有的还要等待时机，以免弄巧成拙。很多结论、决定，都是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和认识来判断的，不少内容即时看合理，但过时看却显出问题。如“文化大革命”中定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判断，绝大多数高级领导人是举了手的，全国人民大多数人也是表示拥护的，虽然可能有对毛泽东盲目崇拜和慑于林彪、康生、江青淫威的因素干扰，但总包含有对材料的认同因素在内，只是事过境迁之后才感到这一评价的荒唐和不可靠性。相反，康生去世时，评价甚高，在当时，大多数人是认为合情合理的，但拨乱反正之后来看他，却是坏蛋一个。所以，“盖棺定论”也靠不住。它说明，在评价一个人时，放一段时间，不匆忙作结论，有益无害。当然，在需要即时即地评价一个人时，也要敢于作出，而且只要是实事求是，一般是有一个八九不离十的。如我党对华国锋功过的评价就是比较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二是只因评说太敏感，容易引发人际关系的紧张和政局的不稳定。越是相近的人物，第一必然涉及他周围利益相关的人物或群体，第二必然涉及现行的政治和政策。如果不管什么现实中的人，尤其是高层权威人士，可以任由人们去评论和研究，就有可

能把事情弄糟。西方舆论总喜欢在我国高层领导层中寻找派别和矛盾，它的分析似乎也是有条有理的，但它的分析，一方面是按西方的标准和逻辑进行的，另方面所说的内容也是真真假假，即使是真的内容，也是夸大了事实，所以到后来大都是难圆其说。

尽管有这样一些客观原因，只是说明文字上的评价、正式的评价需要慎重，其实民间的评价却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即使在专制高压时代，也是悄悄发生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其次，评价人物的总体要求是相同的。我以为，无论是评价死人还是活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具体标准可能有所不同，但总体标准、主要标准应该是相一致的。比如，实事求是就应该是评价人物的总标准、总要求。所谓实事求是地评价人，就是要联系当时当地的情境，来分析评价对象的所作所为，既不任意拔高，也不轻易贬低，更不无中生有，做到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在评价人物的历史上，如何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既有很多的经验，也有不少教训。如我国批林批孔时期，“四人帮”为了达到他们打倒某人的目的，可以任意设计孔子形象。先是说孔子的一只胳膊因残废也是端着的，意在影射周恩来；后为了影射华国锋，又说孔子在鲁国也当过代理宰相。如果历史变成了由双手任意梳弄的少女头发，那就毫无实事求是可言了。

另外，还有一些标准也是可以“一把尺子量到底”的。比如，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就可以成为衡量古今中外人物功过是非的主要标准。当然，这种“有利于”有相对与绝对之分，有的有严格的时空条件限制，有的可以超越时空条件而具有普遍性；有的作用大一些，有的则只是“杯水车薪”之功。

如果把“三个有利于”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就可以构成人物评价的主要体系了。有的观点曾认为，对待非同时代人物是无法进行比较的。其实又对又不对。对的是有些内容是无法比较的，如关公战秦琼，谁输谁赢，肯定是荒唐之举，没有可比性；不对是说并不能由此否定没有可比之内容，不少内容是可以比较的，正是通过这种比较，才显示出思想的发展性、时代的前进性和制度的优越性。我们说马克思要高于前人，是因为在总体上他提供了比前人更多的先进理论成果。列宁说：“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① 如果用多重标准来衡量，就无法作出这类判断。孔子无疑是当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但他显然无法与当今的毛泽东、邓小平比。之所以这样说，主要依据是两条：一是就二者思想的科学性、先进性来说，后者应该胜于前者，虽然是时代发展的结果，因为孔子时代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而且后者也离不开对孔子思想等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但毕竟超越了，大大地超越了，这是事实。二是就二者的历史作用来看，毛泽东和邓小平解决了中国历史上的两大难题，一个是使中国脱离半封建半殖民地而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一个是使中国走上了真正国强民富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这两大贡献是空前的；而孔子主要是以对后人的思想影响见长，在同时代并没有解决可与后者相比的这样全局性的历史难题。对历史人物不可苛求，一是说不能拿今天的一些时代色彩非常浓的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58页。

准来套前人，如不能要求孔子也要有今天马克思主义这样的先进理论，只要有同时代的合理思想、先进思想，就应该肯定。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不及后来的毛泽东思想，但这种主义在他那个时代是合理的、进步的，也起过巨大历史作用，无疑不可抹煞。二是一个人的历史作用，除了主观因素之外，更多的是受制于历史条件。诸葛亮纵然有旷古济世之才，也只能落得个魂丧五丈原一隅。所谓“生不逢时”、“无力回天”，就是这种历史现象的生动概括。不苛求，就是指要历史地看问题，实事求是，并不是说不可以合理地纵横比较。当然，评价标准既是一个包含很广的概念，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即使是现在认为最科学的标准，随着时代的检验和认识的深化，也可能又有矫正、补充、完善之处。这就是真理的二重性，不足为奇。

再次，评价人的方法也应是大同小异的。无论评价何种人，从今天的时代条件出发，都需要调查研究，从事实出发，唯物辩证地看问题；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从经济状况入手，分析各人所属的阶级和态度；都需要历史主义的方法，从当时当地的条件出发，历史地看问题；还有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结构论、实证法、定量法，等等，都是需要作为评价工具之用的。正如打仗不怕武器越多越精一样，评价人也是工具（方法）越多越科学越好，十八般武艺都会，对付起来肯定得心应手。可能有的人认为，研究现实中的人，不需要历史主义的方法，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其实，历史只是一个时间差的概念，凡过去了的都可为历史，昨天相对于今天就是历史。所以，现实中的人的一生，也并不只停留在今天这一点上，而是由无数个昨天这样的历史组成的，要客观公正地认识他、评价他，也有一个需要从当时当地当情的历史条件出发的问题。例如，当

初赞成“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积极主张打倒刘少奇的人，现在大有人在，是不是就可以凭此断定他是不可信任的人呢？不能这样作结论，应该考虑到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不可苛求。有一则真实故事很说明问题。有一位教师平时表现很好，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而且也一直追求入党，但每次发展党员都轮不到他。上级党组织不得其解，就查问下级组织，回答是有人看见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帮助“造反派”提过写标语的墨水桶。至于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哪些具体表现，无人调查，仅此一桶墨水就断送了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实在草率。如果没有其他显著的劣迹，在那个非常年代，几乎人人都是“疯子”，他帮学生提一桶墨水又算得了什么！这一点只有亲身经历过那个疯狂年代的人才会有深刻而清醒的感受。可见，历史主义的方法，无论对何人都是需要的。

第二，评价属性的界定。

作为人物评价，肯定是一种价值性判断，即善恶、好坏、正误、功过等范畴的判断。这是不是就会远离求真的目标呢？它与事实性判断关系究竟会如何呢？我以为这种背离在历来的评价中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但是，正如真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可以统一一样，作为力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头脑的评价主体，也是能逐步通过这种评价，把事实性判断与价值性判断、真与善内在地统一起来的。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正是基于这样两个认识前提，本书就如何认识和评价人物作了一番探讨，而且更多的是侧重于认识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每一个人。

丑媳妇总要见公婆。让我们打开书卷吧，敬请读者来一番评价的评价！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人物评价的必然性	(1)
一、人物评价的古与今	(1)
二、人物评价的缘与由	(10)
三、人物评价的类与别	(21)
第二章 人物的思想结构	(26)
一、思想结构的图式	(27)
二、思想结构的特点	(33)
三、思想结构的启示	(43)
第三章 人物成长的必要条件	(58)
一、人物成长的时代条件	(59)
二、人物成长的环境条件	(65)
三、人物成长的主观条件	(74)
第四章 人物成长的偶然条件	(83)
一、客观的特殊条件	(83)
二、客观的偶然条件	(88)
三、主观的偶合条件	(98)
第五章 人物成长的家庭条件	(102)
一、富有家庭的客观作用	(103)

二、富有家庭的内部影响·····	(110)
三、由此得出的几点启示·····	(115)
第六章 人物的思想转变·····	(121)
一、思想转变的界定·····	(121)
二、思想转变的条件·····	(125)
三、思想转变的形成·····	(136)
第七章 人物评价的基本要求·····	(142)
一、人物功过的客观性·····	(142)
二、人物作用的历史性·····	(150)
第八章 人物评价的主要标准·····	(159)
一、评价标准述评·····	(159)
二、评价标准的科学界定·····	(179)
第九章 人物评价的制约因素·····	(187)
一、评价中的盲点和误区·····	(187)
二、产生误区的缘由·····	(195)
第十章 人物评价的相关方法·····	(209)
一、评价方法述评·····	(209)
二、科学运用方法·····	(217)
主要参考论著·····	(233)
后记·····	(236)

第一章 人物评价的必然性

人类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人物个体有什么作为，有哪些功过，都是客观存在着的，后人和同代人对他们进行评价是十分自然的。可以说，评价人物，尤其是杰出人物的功与过，是人类社会尤其是进入有文字的历史以来，古今中外所不可缺少的一项历史活动。它既反映了人类思维的认识本能，也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历史主动性。

一、评价人物的古与今

认识和评价人物，并不是始自今日，也不只是限于中国，是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尤其是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人类的一种共生的认识活动。因为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要谋生，要分工，要管理，要交往，要追求，要思考，就会有对人的认识和评价。

这种评价，最初形态应该始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本能。人类要发展，首先就要繁殖，就要找对象。择偶标准尽管各种各样，而且有一个发展水平问题，但不管是原始人还是现代人，总是有所选择的。选择就是对对方的评价，至少有美不美、好不好两个评判标准。美不美，讲的是外在条件，好不好讲的是内在条件。不讲任何条件的择偶（相对而言）是不存在的，因为连动物

都要通过竞争才能“上岗”，何况具有思维的人类呢？再如，选什么样的伴，交什么样的友，拥戴什么样的人，都有一个评价的问题。荀子讲“游必择士”，孔子讲“里仁为美”，孟母有三迁，讲的都是对朋友、对邻居的选择。人们为什么拥戴尧舜禹，就是因为他们为人民做了很多的好事，如大禹为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多么感动人！这就是因评价而作出的选择。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人们的评价活动逐步由自发评价到自觉评价，由口头议论到文字记载，由与个人直接相关利益（如择偶、择友等）的评价到与自己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相关的评价（如对帝王将相等政治人物等），由零散评价到系统评价。到今天，人物的评价活动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的重要认识活动了。

以中国为例，这种文字评价始于简单汇编言论文诰成册的《尚书》。之后，就是按年月顺序排比史实的《左传》。《左传》善于描写历史人物，对许多正反面人物都有深刻的刻画和精当的评价。写春秋五霸人物，各具特色。书中讲的虽然是他们争霸、称霸的过程，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他们的评价。如对晋为什么立悼公作了一番这样的评价：“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二月乙酉朔，晋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责，逮鰥寡，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时用民，欲无犯时。……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逾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①对晋悼公的这番评价，道出了他的为政为人，赞颂之意溢于言表。如对秦穆公这个人物，《左传》也用了不少笔墨，通过他对许多事情

① 《左传》第155—156页。

的处理，说明他是一个贪婪、虚伪、反复无常、利令智昏的人，同时也认为他是一个能悔过自责，承担失败责任的人。对宋襄公的迂腐可笑，书中也作了集中的描绘和评价。

孔子的《论语》，虽与《尚书》一样是言论汇编，但在这些精辟的言语之中也包含着对人物的评价。如评价泰伯时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评价樊迟是“小人哉，樊须也”，而子产“惠人也”。还在多处评价管仲，认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到了汉代，出现了三大史家，一是司马谈和司马迁，二是刘向和刘歆，三是班彪和班固。三氏各创一体，成就斐然。如果从人物评价这一角度论，司马氏父子成就最大，次为班氏父子。“史之体例，迁实创之”。^①司马迁首创纪传体，它上起五帝，下迄汉武，《史记》共130卷，其中列传70篇、世家30篇、本纪12篇，占了112卷，这112卷，都是为历史人物立传的，展现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

自《史记》诞生之后，这种编纂体例就基本定向定位，每一朝代都有，有的全部是本纪和列传。如《三国志》、《南史》、《北史》等，未发生大的变化。袁枢的纪事本末体，是编年体或纪传体本纪部分的变化形态，班固的断代史《汉书》也只是《史记》的“具体而微”的一个横断面，杜佑、马端临的专史同样是《史记》“得其一体”的形式。纵观中国“二十五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武昌起义赶走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五千余年间，其中的纪传体内容都占相当比重。所谓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述当时的史实。“纪”为帝王本纪，列在全书之前，“传”

①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丛》。

为其他人物列传。

当然，从总体上讲，这种纪传体把观察、评价的视角主要放在帝王将相身上，对中下层人物则很少论及，要写，也只是有一些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贞女、烈妇、孝子。而且，这些评价对尊者贤者基本上都取隐讳态度，只歌功颂德，缺乏全面性。但有三点是值得肯定的：

第一，它毕竟写了人，重视人，体现了人创造历史的活动。恩格斯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① 人的历史为人所造，这本是常识，但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古代，神创造人类历史的认识比较普遍，尤其在西方古史家那里，他们笔下的历史都是神迹的记录，人在史书中只是神的附属品，只有在宗教史的字缝中才可依稀看到人的活动。我国的二十五史及其他一些史书，却始终围绕人物这一主线进行编纂，以远古重要人物黄帝开其端，以众多清官廉吏、功臣学子、孝子节妇、“盗贼”、“奸凶”结其终，阅尽人间众生相。尽管有的史书也有较浓的宗教色彩，如《南史》等，但人一直是主线。这些都是西方的“神迹”史学所不可比拟的。

第二，它毕竟写出了许多代表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代表人物。在他们笔下，许多杰出人物跃然纸上，展现眼前，令世代炎黄子孙叹服、骄傲！令中华民族永远鲜活、自豪！例如，《通鉴》在评价刘邦何以得天下时，记述了刘邦自己一段很精彩的表白：“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